

董治安 主編

唐代四大類書





董治安 主編

唐代四大類書

清華大學出版社

北京

第一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代四大類書/董治安主編.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ISBN 7-302-06715-5

I. 唐… II. 董… III. 百科全書—中國—唐代 IV. Z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47110 號

出版者: 清華大學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總機: 010-62770175

地 址: 北京清華大學學研大廈

郵 編: 100084

客戶服務: 010-62776969

責任編輯: 馬慶洲

封面設計: 常雪影

印刷者: 清華大學印刷廠

裝訂者: 三河市印務有限公司

發行者: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開 本: 185×260 **印張:** 140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302-06715-5/Z · 134

印 數: 1~1000

定 價: 590.00 元(全三冊)

主編

董治安

副主編

王承略

編纂

劉保貞

楊錦先

李峻嶺

項永琴

出版說明

類書是輯錄各門類或某一門類之資料，按照一定方法編排，以便於尋檢、徵引的工具書，兼具「百科全書」和「資料彙編」雙重性質，故《四庫全書總目》曰：「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

中國古代類書的編纂源遠流長，一般認為，魏文帝曹丕時編纂的《皇覽》乃中國類書之祖。自《皇覽》以下，中國歷代王朝均有述作，惜六朝以前者皆已亡佚，今傳世者以成書於隋末唐初及唐中期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為最古。這四部類書，保存了大量的唐以前的遺文秘笈，而這些典籍十之八九今已不傳，所以在校勘古籍、輯錄佚文及查找唐以前詩文典故和文獻資料等方面，其作用十分巨大且無以替代。

四部類書現通行版本中，有的改動底本而未出校記，有的縮印本字體過小，不便翻覽，有的則許久未見整理影印，不易尋覓。有鑒於此，我們將此四書彙為一編，以《唐代四大類書》之名，依大開本影印出版，並附索引（將單獨出版），以便於研究中國學術與文化的學者使用。我們約請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董治安教授主其事，由王承略教授襄助之，二人甄別版本、修補脫漏，費時近兩載，始竣此事。對兩位先生所付出的辛勞，在此表示謝意。

《唐代四大類書》所用版本如左：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廣陶三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重刻陶宗儀傳鈔宋本；

《藝文類聚》，一百卷，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影印南宋紹興刻本（紹興刻本原缺卷頁，中華書局影印時用明胡繼宗刻本配補。紹興本斷版嚴重，殘缺漫漶之處觸目皆是，難以卒讀；配補用的胡本亦間因斷版而缺字。此次整

理，依據胡刻本、汪紹楹句讀本，並覆核所徵引的原始文獻，對殘缺字、模糊字加以修補，書後附《藝文類聚修字補字表》；

《初學記》，三十卷，清光緒九年南海孔廣陶刻本（即《古香齋袖珍十種》本）；

《白氏六帖》，三十卷，一九三三年吳興張芹伯影印南宋紹興間明州刻本。

清華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二〇〇三年五月

前言

(一)

在我國源遠流長的學術史和文化史上，數量可觀的一批類書，以其特殊的文獻保存價值和資料查詢功能，一直受到廣泛的重視。其中，纂修於隋末的《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陸續編集於初唐和唐前期的《藝文類聚》（一百卷）與《初學記》（三十卷），以及成書於中唐的《白氏六帖》（三十卷）等四種，尤以去古未遠而流傳較廣，隋唐以前秘笈遺文往往托以得存，形式上亦不無創制起例之功，更多為學界所矚目。

據現有記載，類書的編纂，至少在曹魏時期已經開始。《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稱：「（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雖未著「類書」之名，實已初具「類事之書」的性質。其後，南朝梁武帝蕭衍命尚書左丞劉杳撰《壽光書苑》二百卷，蕭衍弟安成康王蕭秀令戶曹參軍劉孝標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梁武帝復命諸學士纂《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北朝則有北齊後主高緯命祖珽等編集《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等，類書的基本體式遂被逐漸固定了下來。可惜的是六朝時期的上述類書，都在歷史上久已失傳了。

隋唐時期，類書的編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主要是因為，南北長期分裂的局面復歸於統一，全國經濟文化趨於興盛，各種文獻典籍更加繁富。據編撰於初唐的《隋書·經籍志》不完全的統計，僅隋代所知「四部」圖籍，總計已達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之多。宋歐陽修等所撰《新唐書·藝文志》論開元之際「藏書之盛」有道：「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如此大量湧現的各種經義的疏解、史料的編集、子書的撰著、詩文別集以及釋典、道經等，就數量與門

類而言，固遠非東漢以前能夠相比，即使較之魏晉南北朝時期，事實上也有了新的發展、變化。空前浩繁而門類衆多的文獻典籍，一方面爲人們的研讀、參閱提供了愈益豐富的內容，另一方面，則無疑較此前更加難以遍觀盡覽，隨之也增加了查用或徵引資料的不便。於是，怎樣在繼承六朝傳統的基礎上，著眼於取精用弘，編制新的「類事之書」，顯然就成爲應時之需了。

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文學的發展迅速，文體的區分更趨嚴格，對於詩文創作形式的要求也更加重視和自覺。從詩歌創作領域說，在南朝「齊梁體」發展的基礎上，唐初出現了強調聲律、對仗和講求用辭、用事的「近體詩」（包括五、七言律詩以及長律與絕句等），並很快廣泛流行，達於極盛。而在散文創作方面，隋唐上承六朝，社會繼續瀰漫著崇尚駢語儷句的風氣，文士的寫作既多事雕琢，王朝的詔令敕誥更大量採用駢儷文體。凡此，似乎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此一時期類書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另外，隋唐又是我國古代科舉制度由開始創設到趨於完備的階段，在爲士人所設「明經」、「進士」等主要考試科目中，要求熟練默寫經書、經注原文，背誦詩、賦、雜文等，這在客觀上也進一步促進了編纂類書的社會需求。

隋唐時期，類書受到空前的重視。《隋書·經籍志》開始注意彙錄各種類書，統附於子部「雜家」；《舊唐書·經籍志》於「丙部子錄」十七家中專設「類事」一家，《新唐書·藝文志》進一步在「丙部子錄」十七種圖書中建立「類書」部，第一次標舉出「類書」之名。兩唐書雖然先後編撰於五代與北宋，但上述典籍分類能夠反映有唐一代類書流傳的實際。

迄於唐末，流傳於世的各種類書究竟有多少，已難於具體回答。查《舊唐書·經籍志》載「類事」二十二部，凡七千八十四卷（按其中約五種爲六朝之作），《新唐書·藝文志》載「類書類」十七家，二十四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按其中約六種爲六朝之作）。隋唐之際類書的數量大大超越前世，由此可以想見。其中，如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高士廉、房玄齡、魏徵、楊師道等奉詔編撰的《文思博要》，長達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堪稱皇皇巨制，也

是自魏晉有類書產生以來所僅見的。

正是在隋唐時期的文化需要和類書總體發展的基礎上，才最終使得四大類書的湧現成為可能；而四大類書能夠千餘年流傳不衰，一直被學界視為彙聚唐以前古文獻資料的淵府、宋以後類書編纂的某種規範，更不是偶然的。

(一)

虞世南編纂的《北堂書鈔》，是四部類書中最先問世的一種，也是現存保存完整的一部最早的類書。虞世南是由隋入唐的人，而此書的編纂卻是在他任隋朝秘書郎之時。「北堂」是隋秘書省的後堂。秘書郎掌管典籍收藏與圖書管理，能夠廣泛接觸各類圖籍，虞氏又博學而長於翰墨、文藻，參加過官修類書《長洲玉鏡》的編纂，因而有條件「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劉餗《隋唐嘉話》），獨力編成一部新的類書。由於此前的類書的編製，都是基於滿足皇帝省覽的需要，或者是適應貴族侯門的某種追求和雅趣，咸由王朝、官府組織編纂，帶有官修的性質，而《北堂書鈔》則主要由虞世南個人完成，這就與「奉詔」修書有所不同。此書的出現，開創了私家編撰類書的先河。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分八十部，八百一類。」今本已有散佚，現存一百六十卷，分為十九部。在編寫體例上，《北堂書鈔》無疑借鑒和承襲了六朝已有形式，然而也作出了顯著的改變。此前類書對古籍分類的徵引，一般是採用「分條平列」的辦法，即於每一條目下簡單排列書名，依序徵引古籍原句，而虞世南卻在各個類目下有意以大字摘句（某項事典）作為突出的標題，再以小字將一系列書名並相隸屬的故事（包括有關解釋等）排比於後，被稱為「標題隸事體」（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這是一種頗具創意的新體例。由於這種體例更易於觀覽、便於查尋和徵引資料，常為唐宋以後許多類書所沿用。

《北堂書鈔》卷帙不算浩大，但由於成書於隋，所輯文獻均屬六朝以前古籍，十分難得。嚴可均《鐵橋漫稿·書北堂書鈔原本後》說：

「《北堂書鈔》所鈔之書，皆三代、漢魏，迄於宋、齊。其最晚者，沈約《宋書》、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其詩賦頌，則顏、謝、鮑爲最晚。陳、隋只字不鈔。」這是今存其他類書所不能比擬的。

《藝文類聚》是李唐立國後最先編成的一部大型官修類書。高祖李淵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詔令編纂，歷時三載，於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竣事，參編者約十餘人，領修者是歐陽詢。全書一百卷，分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個類目，總字數約達百萬言以上，規模超過了《北堂書鈔》。

在類書修撰史上，《藝文類聚》的最大貢獻，是在於並重事典與辭藻兩方面資料的徵引，開創了「事」、「文」兼載的新體式。歐陽詢在卷前《序》文中說：「……前輩綴集，各杼（抒）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意既殊，尋檢難一。」又自道其新體云：「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六朝迄隋，類書以隸事爲主，而詩、文、賦則保存於各種總集，兩者歧爲二途。歐陽詢等以兩者合而爲一，使新編類書既可「類事」復能「類文」，就能夠把原屬各種詩、文、賦總集的一部分內容融入了類書。這固然反映了唐初社會對於「藝文」的重視，其中包括着對於駢詞儷語的種種特殊需要等，而在客觀上，《藝文類聚》的出現則更加拓廣了類書的應用功能，提高了類書的使用價值和文獻價值。宋代修《事文類聚》、清人纂《淵鑒類函》，都是基本援用了《藝文類聚》的體式，而又有所發展的。

《初學記》是纂修於盛唐的另一部官修大型類書。據說，玄宗李隆基嫌諸皇子習文所用圖籍過於龐雜，查閱不便，因命集賢院學士徐堅、張說等，「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劉肅《大唐新語》）。其書於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編就奏上。

《初學記》的問世，上去《藝文類聚》成書已經一百餘年，其間，先後湧現的重要類書（僅據《新唐書·藝文志》所

載)有七部之多,可見這一階段此類圖籍編輯風氣之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后武則天時曾就太宗時高士廉、魏徵等所纂《文思博要》加以修訂增補,編成《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徐堅、張說都參加了具體的訂補工作。因此,《初學記》的編纂雖出於適應「初學」的需要,卻由於汲取了初唐以來類書編纂的豐厚經驗,加上修撰者的主觀努力,最終能夠較好地「撰集要事並要文」,成為一部內容較為精湛、體式進一步趨向完備的類書新編。

《初學記》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個子目。其於體式上的突出特徵,是每一子目都具體分為「敘事」、「事對」、「賦詩文」三個部分。如果說「敘事」部分是「標題隸事」形式的演化,「事對」部分借鑒了如《編珠》、《兔園冊府》等「隸事為對」的編纂特點,「賦詩文」部分也不過是在傳統「類文」的基礎上更加擴大了文體引用的範圍,那末,《初學記》首次把這三個部分融於一體,則在類書體式上表現出明顯的開拓創新意義。另外,其「敘事」部分雖與此前「標題隸事」的方式相似,其實卻也有了重要的發展變化。此前「隸事」的「標題」往往只是較為單純的排比、彙輯,彼此缺乏邏輯的聯繫;而反觀《初學記》,則有意把「類事」各條串聯了起來,收到「雖雜取群書,而次第若相連屬」(《四庫全書總目》)的良好效果,從而起到了闡釋和說明子目「標題」的作用。《初學記》在編纂形式上的這些特點,應該說標誌著我國古代類書在體式方面的發展已經趨於相對穩定和更加成熟。

中唐時期產生的《白氏六帖》,是《北堂書鈔》以後又一部私家纂著的重要類書。編輯者是著名文學家白居易,而《六帖》之名卻很可能「乃當時所加,非白傳舊題也」(參用傅增湘說,見所作《宋本白氏六帖事類集跋》)。其內容編排,亦大體與《北堂書鈔》近似,基本沿用了「標題隸事」一體。

《白氏六帖》共三十卷,不設部、類,僅一併劃分為一千三百六十七門。由於編排零散而缺乏系統,內容存在不少疏誤,加以引用古籍又往往不載書名,都屢為後人所譏。然而總的看來,其書廣泛涉及唐以前經、傳並各家詩文著作,舉凡成語掌故、麗辭佳句都有豐富徵引,畢竟能夠很大程度地適應一般士人援引事典、擷取辭藻的需要。《白氏六帖》對於中唐以後類書編纂工作的影響及其在類書發展史上的地位,應當給予全面的評價。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盛均《十三家帖》，有注云：「均字之材，泉州南安人，終昭州刺史。以《白氏六帖》未備而廣之，卷亡。」可見早在白氏當代，《六帖》的增訂之作已經出現。北宋時，晁仲衍著意為《白氏六帖》添加引文出處，又補其未備，別為《事類後集》三十卷（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另有陳紹纂《重廣六帖學林》，估計也是一部與《十三家帖》性質相近的類書。南宋之初，孔傳編《六帖新書》以續《白氏六帖》，亦稱為《後六帖》或《孔氏六帖》，迄於宋末，白、孔兩書遂被合併刊刻，稱《白孔六帖》，共計一百卷，分子目一千三百九十九門。此外，還有宋末楊伯岳編《續六帖》二十卷，陳應行則「用白氏門類，編類杜詩語」，成《杜詩六帖》十八卷，等等。凡此，都說明了唐宋之際《白氏六帖》的廣泛流傳和備受重視，這在其他類書中也是並不多見的。

（二）

綜上所述，唐代四大類書或以「類事」為主，或既有「類事」兼有「類文」，或以「敘事」、「事對」、「賦詩文」三者並重，而統以類編資料為特色，從而為查尋、利用詞語、事典、文獻典籍等，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其中，就檢索詞語與事典的功能而言，即使在今天，四大類書仍舊可以為多層面的使用者服務，依然能夠在人們的查詢與寫作中發揮某種工具書的作用，這比較明顯，無須多說。下文想要着重強調的是另一個方面，即四大類書在古籍考訂、資料鉤沉和文獻輯佚幾個方面的獨特意義。應該說，這些方面的學術價值是其更重要和無可替代的。

我國歷史悠久，各種文獻典籍浩如烟海。但由於雕版印刷技術發明較晚，直至唐代，大量古籍的傳播仍主要依靠手工傳抄，刻本書較為罕見。而傳抄過程中，衍誤脫竄、魯魚亥豕的現象自屬難免。隋唐去古未遠，四大類書徵引的各種經、傳並百家著作，盡屬此前傳抄的古本，往往與宋以後的傳本有所差異，這就為今人的校勘古籍、考訂文字提供了最直接的參考和依據。

比如，今本《尚書·舜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北堂書鈔》卷十九《帝王部·歎美》引作「詢事考言，乃底可績。」考《史記·五帝本紀》有「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之語，知今本《尚書》「乃言」之「言」是衍文，而明抄本《北堂書鈔》引用《尚書》古本不誤。又如，今本《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句中「焚」字殊覺費解。孔穎達《尚書正義》引服虔云：「焚，讀曰償。償，僵也。」所釋亦難順通。今考《北堂書鈔》卷三十《政術部·貪暴》引此語，則「焚」字作「焚」，為焚籠之意。以此解《左傳》，顯然是於義為長了。再如，《藝文類聚》卷八十九《木部下·梓》節抄《尚書大傳》「伯禽、康叔見周公」以下一段，頗與李善《文選》（王憲集序）注所引《尚書大傳》不同。值得提出的至少有兩點：其一，李善引本「梓木晉而俯」句，《藝文類聚》節抄本作「見梓，晉然實而俯」，是屬異文，可供進一步研究。其二，《藝文類聚》節抄本於「晉」字下保留一條重要的鄭玄註：「晉，肅貌。」清人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定本》留心於此，強調指出：「此注惟見《藝文類聚》。」今按，這是「晉」字一個極為少見的義項，現代大型辭書《辭源》、《辭海》（包括修訂本）均付闕如，說明此義項久已隱微。

清人劉毓崧《通義堂文集》卷五，有《校刻漢書凡例》一篇，共十一則，其第二則指出：「類書中時代近古者，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之類，所引《漢書》，皆唐以前舊本……所當取校，以溯宋本之源。」劉氏推重隋唐類書用於古籍校勘的學術價值，甚至明確肯定四大類書可「溯宋本之源」之足資寶貴的作用，是很有識見之論。

隋唐四大類書既有「類事」的傳統，其所保存各個方面的重要史料可以說比比皆是。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序》中提到，《藝文類聚》卷八十《火部·燈》收錄殷巨的《鯨魚燈賦》，又卷八十五《布帛部·布》收錄其《奇布賦》，都記載了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晉書·武帝紀》作太康五年，西晉與大秦的友好關係，可補《晉書·大秦傳》的疏略。同書卷十一《帝王部·總載帝王》收錄王粲《難鍾、荀太平論》，卷三十六《人部·隱逸上》載麋元譏許由，卷三十七《人部·隱逸下》載麋元吊伯夷，對「周公致太平」和「隱逸」現象，都保存了很有代表性的獨特觀念，為研究魏晉思想史提供了值得重視的參考文獻。

司義祖《初學記校點說明》也提到《初學記》中不少可供利用的珍貴文獻記載，如唐初魏王李泰等修撰的《括地志》，是一部五百多卷的地理書，原著早已亡佚，其《序略》僅見於《初學記》卷八《州郡部·總序州郡》，其中可以窺見貞觀間政區的劃分和州縣的數目，清代學者孫星衍就是據此輯成《括地志》八卷。又同書卷二十七《寶器部·絹》引《晉故事》，久已亡佚，其書記載：「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疋，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疋，以其絹為諸侯秩；又分民租戶斛，以為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戶三疋，綿三斤，輸為公賦，九品相通，皆輸於官，自如舊制。」不見於《晉書·食貨志》，是研究西晉田賦制度極為重要的詳實資料。

另外，由於宋代及其以後類書的編纂往往從隋唐四大類書抄錄文獻資料，因此四大類書對於後起類書的內容考訂與文字校勘，往往還具有特殊的價值。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早已指出，《太平御覽》「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考之，館閣及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太平御覽》既是「因前諸家類書之舊」，在轉抄過程中必然導致一些文字上的錯誤。今《修文御覽》、《文思博要》等書皆已亡佚，無從核對，但唐代四大類書俱在，稍事對校，就不難發現，同一則資料，一般正是以唐代類書的文字錯誤較少而較為通順。

一九五六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在整理本《藝文類聚·前言》中曾舉例說明，《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有兩條資料本來引自《淮南子》，但漏掉了書名，結果被當成出自《韓非子》，以至於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時竟作為《韓非子》的佚文收錄了，而《藝文類聚》卷六十《兵器部·箭門》所引，《淮南子》書名，卻赫然在焉。又如，《藝文類聚》卷六十九《服飾部上·案》引《楚漢春秋》「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一段，亦見《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三《服飾部二·案》，二者文字略有不同，但可互補；然而《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十《服用部十二·案》所引，文字

已訛誤過多，不可卒讀。再如，《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二《禮儀部四一·諱》引東晉裴啓《語林》一段，其中雜入他書文字而漏掉書名，清人馬國翰未加留意，全部撮錄作爲《語林》的佚文，魯迅《古小說鉤沉》則根據《北堂書鈔》卷九十四《禮儀部十五·諱》所引，將雜入的一段文字刪除。《太平御覽》向來最爲學界所重，其纂修年代與唐代最近，尚且如此，宋以下抄錄唐代類書或轉抄自《太平御覽》的新作，問題就更不難想見。

(四)

我國古代由於各種自然災害和人爲的原因，造成大量圖籍的淪喪或殘缺。喪亡者，有的僅存書名於各種目錄學著述，有的則連書名也沒有流傳下來；殘缺者，也由於不得識其全貌而爲研讀者留下深深的遺憾。四大類書都是規模宏大、徵引廣博的鉅編（如據《北堂書鈔》校勘者孔廣陶統計，是書除「集部」外引書達八百餘種；而據北京大學研究所一九二三年統計，《藝文類聚》引書則已有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之多。《初學記》、《白氏六帖》雖無引書量的確切統計，估計爲數亦不在少），而其所抄輯的唐以前古籍，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已不傳或殘缺，這樣，四大類書客觀上就成了保存唐以前各種典籍的淵府，能夠爲後人的古籍輯佚工作提供必要的參考或直接的文獻根據。

梁啟超先生在談到清代學者輯佚的依據時，列舉五類資料，而把唐宋類書視爲總資料（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置於五類資料的首位。接著梁啟超臚列唐宋著名的類書，首先列舉了《北堂書鈔》等隋唐四大類書。其實，四大類書的輯佚功能，早在宋代就被注意到了。陳振孫指出，《藝文類聚》「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到了清代，隨着輯佚之風的興起，人們對四大類書的這一功用認識得更加清楚。《四庫全書總目》的《子部·類書類》小序稱：「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托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

諸編，殘璣斷璧，至掇拾不窮，要不可謂之無補也。」《藝文類聚》提要又曰：「隋以前遺文秘笈，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書，尚略資考證。宋周必大校《文苑英華》，多引是集，而近代馮惟訥《詩紀》、梅鼎祚《文紀》、張溥《百三家集》從此採出者尤多，亦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百代者矣。」誠如《總目》所言，明代人輯漢魏六朝人集，清代人輯佚四部群書，從四大類書中獲益最多。我們只要看一看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書，就會發現，四大類書之被徵引的內容或文字，都可以說在在多有。而如果没有隋唐四大類書，他們的輯佚工作就會更加困難得多。

這裏，試就四大類書的輯佚作用再補充幾條實例，以見其難得的文獻價值。

一、今本《韓詩外傳》已是不全之本，亡佚的文字有些幸賴隋唐四大類書而得以保存。《兩漢全書》（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的《韓詩外傳》整理本，即據《北堂書鈔》補佚文二條，據《藝文類聚》補佚文二條，據《初學記》補佚文一條。另有《北堂書鈔》所引一條、《藝文類聚》二條、《初學記》二條，又見於其他古籍，但文字稍異，可互為補正。

二、汪文臺《七家後漢書》中所輯謝承《後漢書》，共得三百四十八人的傳記材料。其中一百一十人的資料完全或主要依據《北堂書鈔》引書，三十八人的資料完全或主要依據《藝文類聚》引書，二十七人的資料完全或主要依據《初學記》引書。以上三大類書共提供了一百七十五人的傳記材料，占所輯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

三、湯球《九家舊晉書輯本》中所輯臧榮緒的《晉書》，共得材料八百一十條。其中，出自《北堂書鈔》引書三百一十八條，出自《藝文類聚》引書二十三條，出自《初學記》引書三十八條，出自《白氏六帖》引書二條，共得四大類書引書資料三百八十一條，占所輯資料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七。

四、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所輯郭義恭《廣志》，共得材料二百七十一條。其中一條輯自《北堂書鈔》，四條據《北堂書鈔》參校，三十七條輯自《藝文類聚》，十五條據《藝文類聚》參校，三十三條輯自《初學記》，七條據

《初學記》參校；一條輯自《白氏六帖》。據四書所得材料共九十八條，占所輯全部條數的百分之三十六。

五、嚴可均《全三國文》輯錄曹植賦五十四篇，其中三篇引自《北堂書鈔》，二十六篇引自《藝文類聚》，四篇引自《初學記》，兩篇並引自以上三大類書，十二篇並引自《藝文類聚》、《初學記》，兩篇並引自《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共計四十九篇引自三大類書，占總數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一。

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錄梁元帝蕭繹樂府詩一百一十首，其中六十一首引自《藝文類聚》，十首引自《初學記》，十一首並引自《藝文類聚》和《初學記》。共計八十二首錄自兩大類書，占所輯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

利用類書從事古文獻的輯佚，儘管先人已經做出了可觀的成績，而後續者的工作仍可以說大有可為。從這個方面的需要出發，我們同樣理應把隋唐四大類書置於最足珍視的重要地位，努力使這一古文獻輯佚的寶藏不斷得到更好的開發。

二零零一年冬，應清華大學出版社之約，我們開始了對於隋唐四大類書的編纂和整理工作。我們首先選擇質量較高的版本做底本，底本如有缺頁或頁面殘損，則據同版異本作配補；其中《藝文類聚》因斷版而造成的缺字、殘字以及模糊不清的字情況最為嚴重，則在參考其他版本和覆核所引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先確定殘缺的本字，然後力求在底本中找出該字作剪貼修補，並附列修字補字表以供查考。四大類書統編頁碼，以便影印出版後編製人名、書名、篇名綜合索引。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底本選擇和補版修字方面有不妥之處，敬請海內外讀者批評指正。

董治安 王承略

二零零三年三月於山東大學